

---

# 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变迁

## ——基于云南省 Y 村的个案研究

包智明 曾文强<sup>1</sup>

**【摘要】**：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生计转型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与土地利用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计转型既可以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也可以修复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拟通过对云南山区某彝族村寨——Y 村 5 个阶段生计转型和生态环境演变特征进行分析，阐释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逻辑关联。Y 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过度依赖开发自然资源来推动生计转型，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几年，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带动和村民参与，村寨生计方式逐渐向绿色生态农业转型，正在实现“生态—生计”的互惠发展。

**【关键词】**：生计转型 可持续生计 生态环境修复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1）02—0158—07

###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生计转型是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所谓生计转型，是指与生计模式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人口及劳动工具、所种植作物等因素发生变化时，生计方式发生相应变化的过程。<sup>1</sup>简言之，生计转型是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与土地利用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由于赶超心理和追求“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一条高度“压缩型现代化”道路<sup>②</sup>，更是加剧了土壤污染、森林破坏及水资源短缺等生态问题，影响了可持续生计的发展。因此，在生态环境脆弱的民族地区，协调生计转型、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生计道路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

学界对生计问题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对农村贫困及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并发展出可持续生计的研究范式。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可持续生计的讨论，从最初的经济领域，逐步拓展到社会领域、生态环境领域，并被广泛应用于贫困、脆弱性、土地利用、农村环境、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研究。<sup>④</sup>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和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基于两条路径展开。

一是分析生计转型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生态后果，认为国家、市场、地方社会等多重力量作用下的生计转型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例如，有学者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商品经济的引入、现代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促进了赫哲族生计转型，但同时也造成“公地悲剧”和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sup>⑤</sup>基于鄂伦春族的研究也发现，国家对当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同样带来生计转型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双重后果。<sup>①</sup>中国台湾布农族亦面临相似境况，政府以及市场经济的介入改变了其早期烧垦山田的生计方式，在转向种植大宗槟榔经济作物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sup>②</sup>与之类似，在国家力量、市场经济等作用下，西双版纳地区居民从传统生计向橡胶种植生计的快速转型亦造成热带雨林面积锐减，导致生态环境遭受破坏。<sup>③</sup>此外，有学者通过对西南民族地区林业经济的分析认为，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农耕知识外来化、自然过度资本化和资源管理科层化密切相关，林

---

<sup>1</sup>**作者简介**：包智明，男，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究。  
曾文强，男，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究。

---

业经济的“生产跑步机”效应是造成生态退化的重要机制。<sup>(4)</sup>

二是探讨生计转型的类型及生态治理的功能，认为生计转型有利于环境资源的重新配置，并与其他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例如，包智明、石腾飞基于中国北方草原牧区的实地调查发现，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在促进传统牧民生计转型的同时，也激发了牧民参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学习本土生态知识的热情，使其成为草原生态环境的治理者和保护者。<sup>(5)</sup>换言之，与传统单一的牧业生计相比，生态旅游业融合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建设等多元素，是有益于草原生态治理与保护的的新型生计方式。姜爱、刘伦文对湘西土家族的调查也发现，农、林、牧等多样化的生计方式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土家族地区的可持续生计发展。<sup>(6)</sup>在南部广大的壮族地区，生计方式、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三者的良性互动，也促进了当地生态环境与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sup>(7)</sup>随着外出务工、农作物种植的改变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广西大石山区突出的环境问题逐步得到缓解。<sup>(8)</sup>此外，还有学者指出，维持生计与生态的平衡关系，需要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发展相应的组织、社会规范和本土生态知识，同时规范资源的利用行为。<sup>(9)</sup>

综观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农村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变迁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围绕两者间的关联性，学界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启示的研究。在这一研究进程中，可以窥见生计转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变迁，即逐渐由早期的环境破坏转向环境友好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受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因生计转型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广泛存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治理不可能存在统一模式。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通过个案研究，进一步探索生计转型之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于推动西部农村地区发展“生计—生态”良性互动的经济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云南 Y 村的个案研究，将生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框架，探讨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变迁、可持续生计与生态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索“生计—生态”互惠发展的新思路。Y 村位于云南省中部 L 县，是一个山区彝族村寨，总面积 7.26 平方公里，海拔 1735 米，年平均气温 18.6℃，年降水量 1500 毫米，全村共 251 户，921 人。20 世纪 50 年代至 21 世纪初，Y 村在从河谷水稻种植向山区农业发展进程中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退化问题。近 10 年来，为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气候风险，Y 村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促进了生态环境好转，成为全县山区苗木种植重要基地和生态文明村。

## 二、种植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变迁

农作物种植与生计密切关联，农作物种植结构既决定生计方式，又反映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Y 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彝族村寨，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村寨主要经历了荞麦种植、水稻种植、烤烟和玉米种植、桉树种植、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等结构转变，并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土地利用特征。

### （一）水稻种植

Y 村历史上曾以种荞和养羊为主要生计方式。大约在明朝末期，水稻种植逐渐取代了刀耕火种的荞麦种植成为村寨主要生计方式。水稻种植的耕地主要分为河田和山田两种类型。其中，河田位于河谷地区，依靠河水灌溉；而山田主要分布在村寨周边，靠天然降雨，无灌溉条件。这种分布状况与村寨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Y 村是该区域最早的村寨，当时周边区域还是广袤的原始森林。Y 村率先开发了河谷流域，通过修筑水坝和引水渠发展起水稻种植。至清末民初，水稻种植已从河谷地区扩展到了村寨周边以及较远的山区低凹地带，但这些山田往往因缺少降水和灌溉系统而形成雷响田。土地改革时期，村寨的耕地面积有 800 亩，人均面积 2.67 亩，丰富的耕地资源使 Y 村成为当地比较富裕的村寨。村民生产的稻米除自家食用外，还拿到市场上销售。Y 村的土地开发利用除了水稻种植，还有狩猎、放牧等多种方式，它们有机结合形成了“生活核心区—山田区—林区（牧区）—河田区”的生态功能模式。这种土地功能分区有利于农业种植、牧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平衡，保障了村民生计的发展。

## （二）旱作农业种植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Y 村逐渐向山地旱作农业种植转型。1951 年土地改革后，Y 村部分河田和山地被附近的村寨占有。生存空间缩小、自然灾害频发以及人口迅速增加导致村寨的生存发展陷入危机。在国家“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的政策指导下，Y 村开始大力开发山地和森林系统，调整种植结构。

一方面，在稳定河田生产的基础上，推动山田改造，许多坡地被改造成水田；同时广泛修建简易蓄水池、山渠，用于收集雨水，保证水稻种植生产。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旱地开发，有计划、适度砍伐森林，扩大山地面积。开垦的旱地主要用来种植土豆、玉米、荞子、小麦和红薯等粮食作物。这些作物的种植不仅丰富了食物的供给结构，而且适应了山区缺水的生态环境。尽管这一时期的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但凭借不断增长的耕地面积和村民的勤劳耕种，基本生计得以维持。经过长期造地，村寨的耕地面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增加到 1291 亩，其中旱地面积大幅扩大。然而，这种以森林换耕地的土地开发模式打破了村寨原有的土地生态功能，生计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的失衡问题开始显现。

## （三）烤烟和玉米种植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烤烟和玉米成为 Y 村最主要的种植作物，种植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80%。1981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打破了 Y 村长期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的模式，形成了以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激发了村民的致富热情。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烤烟和玉米种植成为村民增收和村寨脱贫的最主要方式。凭借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并在各级政府及烟草部门的大力推动下，Y 村迅速发展成为全乡最大的烤烟生产示范基地。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烤烟收购价格的上涨和种植规模的扩大，Y 村的“万元户”日益增多。

烤烟种植在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造成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旱地和水田用来栽种烤烟，造成其他非经济作物（水稻、豆类、蔬菜等）的种植面积缩减，村民由粮食自给自足转向依赖市场，导致生活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发展烤烟产业造成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烤烟种植不仅需要大量砍伐森林作为耕地，而且烘烤还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资源。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Y 村的经济高度依赖土地开发，耕地面积爆发式扩大，超过 5000 亩，土地开发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旱地面积超过水田面积。随着大面积开发旱作耕地，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Y 村生态环境开始恶化。

## （四）桉树种植

Y 村大规模种植桉树始于 2003 年。Y 村原本没有桉树，1973 年从外地引进 300 余棵桉树作为风景树栽种。1999 年政府鼓励农户承包荒山植树绿化，发展林业经济。村集体对南部的大溜口、小河片区 1000 多亩荒山实施为期 30 年的承包经营，获得村民的积极响应。因荒山区大多是喀斯特地貌，贫瘠的土壤无法栽种一般树木，桉树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使其成为绿化荒山的种植树木。随后几年，化工产业、造纸业及木材加工业等产业迅速发展，桉树作为重要的基础原料，价格随之暴涨。种植 1 亩桉树可以获得 2—3 万元收益，远超过玉米和其他农作物的种植收益。巨大的经济利益激发了村民种植桉树的积极性。村民纷纷利用荒地、空地大面积种植桉树，种植面积一度超过 2000 亩。

桉树的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桉油提炼，二是木材出售。桉油提炼一般家庭即可完成，木材砍伐和销售则由专门的木材收购商来做。基于此，桉树产业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就业分工形式。村民既是普通种植户，同时也可在炼油和砍伐中就业并获得报酬。桉树产业的发展，除了市场力量的刺激外，还与当地政府的生态治理政策和村寨的生产关系变化有关。为响应国家生态治理及环境保护号召，提升全县生态环境质量，县政府大力发动群众通过种植桉树来改善生态环境。另外，耕地面积的急速增长造成很多农户管理不善，发生广种薄收问题，甚至部分耕地抛荒。政府的鼓励和市场的双重刺激，使得桉树种植成为村民致富的新途径和国家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种植规模的日益扩大，桉树种植的非经济后果逐渐凸显，引发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 （五）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

2013 年之后，Y 村开始大力发展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并发展成为全县山区重要的绿化苗木生产基地。据笔者实地调查，随着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面积增大，村寨烤烟、玉米和桉树的种植规模大幅度缩减。绿化苗木种植约占耕地面积的 50%，主要种植有云南樱花、冬樱花、蓝花楹、雪松、香樟以及海棠等 10 余类本土品种。其中，云南樱花种植规模最大，大约占绿化苗木栽种面积的 50%。除绿化苗木外，Y 村还种植了多种果树，主要有板栗、核桃、桃子、杨梅等，果树种植约占耕地面积的 10%。

种植结构的变化，除与国家政策有关，还与市场强大的利益驱动相关。近年来，随着城市的绿化建设，绿化树木的价格随之高涨。例如，直径 7 厘米的云南樱花能卖 60 元一棵，而 15 厘米的蓝花楹可以卖 300 元一棵。相比 2 元/千克的玉米等作物而言，种植绿化苗木收益更大。如果说绿化苗木种植是为了获得高收益，那么果树种植则是主动规避风险，增加收入的另外一种绿色生计。绿化苗木价格虽高，但生产周期需 4—8 年，而果树种植一般 6 年就能产生持续收入，经济效益显著。如今，Y 村绝大部分农户已经放弃了烤烟、玉米、桉树种植，成为专业的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户。随着村寨生计向种植绿化苗木和果树转型，Y 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好转。

## 三、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恶化

通过梳理 Y 村种植结构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历程，可以发现，从河谷地区的传统水稻种植到桉树产业发展，村寨的生计从传统的生存导向型逐渐转变为经济利益驱动型。在这一过程中，生计转型加剧了生态环境退化甚至恶化。

### （一）旱作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退化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Y 村生态良好、动植物资源丰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然而，自发展山区旱作农业之后，水利建设和毁林开荒造成了生态环境退化。Y 村缺水严重，1956 年至今，先后经历了自主建设、国家支援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的水利项目建设。由于缺乏科学规划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水利建设不仅没能彻底解决村寨用水问题，还造成了植被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退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毁林开荒。在“深挖沟，广积肥”“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口号的号召下，Y 村人生产热情高涨。在“大搞生产”的进程中，大片森林被砍伐焚烧，开垦成耕地。森林系统遭受破坏直接造成动物生存空间缩小，很多动物在这一时期消失。

那个时候（指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村外围都是茂密的森林，村内的山神庙、祭龙塘子、戏台附近也都是厚厚的树林，黑漆漆的。山上的麂子、野兔很多，有时还会跑到村里来。村寨每年都会举办猎神节和祭密枝仪式，祈祷五谷丰登、幸福安康。有位村民小时候和大人去打猎，还被一只豹子抓伤了。后来，国家提倡大力发展生产，严禁打猎。大家就只好砍伐森林开垦荒地，过上了种地的生活，很多动物也慢慢见不着了。（村民访谈，编号 LHP-20190503）

森林是彝族重要的生活场域，也是其生计发展的基础，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森林文化体系。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家权威在地方社会的广泛渗透，村寨多元生计逐渐被整合为单一的旱作农业生计。村寨原本的密枝山祭祀、摔跤仪式以及猎神节等“生计—生态”文化体系也遭到破坏。随着传统生态文化的逐渐丧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改变，“人定胜天”“改造自然”的生存模式改变了村寨的森林生态环境。据估计，村寨的森林覆盖率由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 90% 下降到 70 年代末的 70%，良好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 （二）烤烟、玉米种植与生态环境恶化

在国家主导的农村经济发展逻辑中，通过农业现代化和“科学农业”发展，促进农产品的市场化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如果说村寨集体时代的粮食种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么改革开放后种植结构的变化则体现了市场环境影响下经济至上的发展目标。然而，烤烟和玉米种植规模的扩大以及种植技术的变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村寨生态危机，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那几年（指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国家大力鼓励种植烤烟，村民对烤烟生产的积极性很高，烤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由于地方管理不严，没有及时制止乱砍滥伐现象，导致大片森林被砍伐开垦成耕地。短短几年原始森林就败光了，各种动物、珍贵药草也随之消失，以前绿油油的山成了光秃秃的山，变成了一块块的烤烟地和玉米地。（村干部访谈，编号 LGM-20190621）

相较于公社时期的森林破坏，这个阶段产生的生态问题更加多样化。一是生物多样性锐减。大规模的耕地开垦以及种植结构调整，增加了农作物种植的单一化程度。烤烟发展迅速吞噬了丰富的森林资源，许多动植物销声匿迹。二是农业面源污染加剧。因种植烤烟、玉米过程中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和水源的严重污染。据村民估计，Y 村每年至少需要消耗各类化肥 1000 余吨，使用的农药更是多达 20 余种，其中包括部分毒性较强的农药。三是水土流失严重。Y 村绝大部分是坡地，夏季多暴雨，大面积毁林开荒使得水土流失成为常态。水土流失不仅造成道路损毁，还使农作物受灾，产量降低。四是用水问题凸显。栽种烤烟和喷洒农药需要大量清水，造成生产与生活竞争性用水问题，农忙季节经常发生供水不足的情况。

### （三）桉树种植与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桉树种植作为一种新的生计发展方式，在带来突出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桉树被农民称为“抽肥机”“霸王树”“吸水机”，因此人们通常将桉树种植形成的茂密森林称为“绿色沙漠”。有关学者认为，云南频繁的干旱以及生态危机与大面积引种桉树等速生树种密切相关。<sup>①</sup>Y 村的桉树种植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同样带来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在 Y 村，大量耕作条件较好的耕地被用来种植桉树，不仅造成耕地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导致土地肥力下降，粮食产量降低。另外，桉树蒸腾作用强，会和农业种植形成水源竞争，加剧农业干旱程度。桉树还对本地很多生物具有抑制作用。种植了桉树的地方往往不会生长青草、野菜等，很多食用野生菌也因生长在桉树林而发生变异，不能食用和售卖。此外，桉油提炼还引发了次生环境污染问题。由于炼油设备简陋，加之生产过程缺乏有效监管，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大量粉尘和刺激性气味严重影响村民日常生活。

桉树收益好但坏处也多。前些年，我家的桉树砍伐复耕后，原本的红土地变成了“黄土地”，玉米和小麦根本没办法种了。没有种植桉树之前，村寨的雨水还行，种植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变少了，干旱也在加剧，都说是因为桉树种多了。每年到了秋冬季修枝炼油的时候，空气里总是弥漫着刺鼻的味道。虽然政府明令禁止私人炼油，但私下一直没停过，很多人靠这个挣钱生活。（村民访谈，编号 XFB-20191206）

斯科特认为，现代科学林业过度关注森林的商品属性，为便于管理和经济回报采取简单化的单一树种种植，打破了自然植物相互联合的生态平衡，<sup>②</sup>加剧了森林的脆弱性，引发严重的生态后果。Y 村从毁林到种林、从治理生态到发展经济，林业管理的逻辑明显表现为斯科特所说的“简单化、清晰化和操纵”<sup>③</sup>的特征。桉树种植作为一种新的人工造林形式，本意在于绿化荒山、改善生态环境。然而，在市场的强烈刺激下，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林业商品经济。在实践过程中，桉树种植不仅没有有效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作用，反而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生态格局，引发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 四、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修复

Y 村在经历了烤烟、玉米、桉树种植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后，在国家、市场、地方社会的共同推动下，开始转向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生计方式的绿色转型遏制了村寨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被破坏的生态环境逐渐得到修复。

## （一）生计方式绿色转型的背景及其实践

### 1. 国家政策的推动。

2005年后，L县广大山区发生持续干旱，严重影响农村生计。在国家生态环境政策引导下，县政府确立了“生态强县”的绿色产业发展方针，开始从“滇中粮仓”“工业重县”向“花香水城”“生态文明县”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花卉种植因收益高，风险低，逐渐成为支柱产业。同时，为改变贫困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政府积极推动退耕还林等生态环境治理，推广果树种植，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在Y村的绿色生计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要作用。长期以来，村寨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2008年，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L县修通了从乡镇驻地到村委会驻地的柏油路，后又修建了到Y村的水泥路，打通了村寨与昆明、曲靖和玉溪等主要城市经济往来的通道。此外，借助国家土地综合整治项目，Y村平整了部分陡坡耕地，修建了100余个小型水窖及大量的机耕道路。基础生产设施的建设和强化为绿化苗木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2. 绿色产业市场化体系的建立。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绿化产业发展的刺激下，绿化苗木成为L县主推的绿色产业。相比于传统产业，绿色产业更具现代市场经济特征，开放的市场环境使绿化苗木的销售和定价具有更高弹性。由于绿化苗木收益高，村民对扩大绿化苗木种植的积极性很高。

在Y村，从2008年开始，便有几户人家开始试种云南樱花和蓝花楹等绿化苗木。2013年后，Y村开始大规模种植绿化苗木，最终促成了“生态村”的诞生。虽然市场竞争造成部分外地老板和本地中间商结成利益同盟，在和村民的交易中形成不平等博弈，出现压价购买现象，但随着绿化苗木产业体系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市场调节渐趋平稳，最终形成了稳定的交易体系。绿化苗木种植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 3. 村民经济理性与环境关心的驱动。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Y村丰富的耕地资源并没有使村寨富裕起来，反而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内卷化”现象。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村民通过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和使用大量化肥农药的方式来提高产量，结果不仅没有获得理想的经济收入，还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村民逐渐认识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计发展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实现不了富裕。

随着国家生态治理政策的实施，村民开始主动改善生计策略，积极融入国家主导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村民将农业生产、市场需求和国家生态治理目标相结合，通过绿化苗木种植、退耕还林等来推动生计方式的绿色转型，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刚开始那几年，村民对退耕还林抵触很大，环境保护意识也低，我们的政策执行遇到很多阻力，可以说以前的退耕还林是“失败”的。这些年，国家向农户免费发放板栗树苗、核桃树苗，村民每年还可以领补偿款，同时种果树还能产生经济效益，远比种玉米划算，农户都争着退耕还林。现在村里的树变多了，山变青了，生态环境也好起来了，农民的收入也多起来了。（村干部访谈，编号LXZ-20191221）

## （二）生计方式的绿色转型与生态环境修复

---

生计方式的绿色转型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产出。普通农作物、绿化苗木以及果树的多元化种植适应了村寨的生态环境和生计发展。与此同时，也使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步得到缓解和改善。

#### 1. 减轻面源污染。

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对化肥和农药的需求低，有利于减轻面源污染。例如，种植玉米每年需施用化肥、喷洒农药4次以上，而种植绿化苗木一般只需2次化肥施用和农药喷洒，不仅次数少而且总量低，由此减轻了对河流、土壤的污染。此外，出于市场价格考虑，村民也会尽量避免对果树喷洒农药。

#### 2. 防治水土流失。

果树、绿化树通常根茎发达，可以有效保持水源，防止水土流失。随着退耕还林的实施，村寨大部分坡地成为果树和绿化树种植的重要区域。大面积绿化苗木发挥了良好的生态效应，不仅村寨水源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确保了饮水安全，同时减缓了下游地区的水患灾害，实现了地区生态利益的互惠共享。

#### 3. 缓解水源枯竭和干旱危机。

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使得村寨不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得到有效调整。随着玉米、烤烟、桉树等高耗水作物种植规模的缩减，山地水源涵养功能得到了有效恢复。这不仅确保了必要的生活和生产用水，减缓了干旱压力，也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 4. 恢复生物多样性。

随着绿化苗木和果树种植规模扩大，村寨林业资源得到很大程度恢复。森林覆盖率的提高为动植物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栖息地，促进了鸟类以及其他物种的恢复。

综上所述，生计方式的绿色转型推动了Y村的生态环境修复。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共同在场，合作受益。对国家而言，村寨主动种植绿化苗木和果树降低了其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本，提高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对市场而言，绿色产品改善了市场的商品结构，激活了绿色市场运转和绿色经济发展。对村民而言，绿色经济收益激发了其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and 美丽家园建设的热情，促进了生计与生态的融合发展。总言之，Y村生计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因绿色生态农业的发展正在发生着改变。在这一进程中，不管是国家的生态治理目标，还是村寨的经济发展需求，抑或是市场的有效运行，绿色生态农业有利于实现多元利益主体的共赢，推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统一。

## 五、结论

Y村生计转型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历程表明，生计转型在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引发生态环境的多重变化。一方面，生计转型有可能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例如，Y村从河谷农业到山地农业的生计转型导致山地森林的盲目开发；烤烟和玉米的过度种植又进一步造成森林毁灭、生物多样性锐减、水土流失以及面源污染加剧；桉树经济的发展则又催生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生计转型也有可能推动生态环境修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农业发展以及农民生产生活与自然资源形成了高度紧密的关系，农民生计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达到空前水平，产生了土地退化等生态问题。<sup>①</sup>民族地区更是由于对资源的高度依赖，在“跨越式发展”中形成了“脱嵌型”的资源开发模式，严重影响了内生型、包容性发展。<sup>②</sup>Y村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由于过度依赖开发自然资源来推动生计转型，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几年，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带动和村民参与，村寨生计方式向绿色生态

---

农业转型，生态环境与生计转型的关系也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村寨生态环境逐渐得到修复，村民生产生活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生计转型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生计转型不仅体现出人与社会关系的变革，更深刻影响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Y村生计转型引发的生态环境变迁，反映的是人看待自然与利用生态资源的态度和行为，体现出当地村民逐步将生计“脱嵌”于自然，再到重新“嵌入”自然的发展历程。<sup>③</sup>Y村的案例给人们的启示在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首先需要改变人们对待自然和生态的态度，忽视生态效益的生计转型对生计和生态都不具有可持续性。Y村正是基于对生态环境价值的重新发现，在国家、市场、地方社会的共同推动下，实现了生计的绿色转型与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

#### 注释：

1 本文对地名、人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2 周大鸣、秦红增：《文化人类学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3 刘敏、包智明：《西部民族地区的“压缩型现代化”及其生态环境问题——以内蒙古阿拉善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4 赵雪雁：《地理学视角的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问题与领域》，《地理研究》2017年第10期。

5 张丙乾、靳乐山等：《少数民族现代化与赫哲族农户生计转型：一个分析框架》，《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6 麻国庆：《开发、国家政策与狩猎采集民社会的生态与生计——以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为例》，《学海》2007年第1期。

7 叶煜培：《生计与生态关系之探讨——以台湾南投信义乡潭南村之布农族部落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8 高天明、沈镭、刘立涛、薛静静：《橡胶种植对景洪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资源科学》2012年第7期；周建新、于玉慧：《橡胶种植与哈尼族生计转型探析——以西双版纳老坝荷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9 耿言虎：《远去的森林：一个西南县域生态变迁的社会学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10 包智明、石腾飞：《牧区城镇化与草原生态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11 姜爱、刘伦文：《人地关系与土家族生计变迁六十年——湘西龙山县草果村的再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2 罗柳宁：《生态环境变迁与文化调适：以广西矮山村壮族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S1期。

13 刘建民：《生态与生计：广西大石山区石漠化治理研究——以马山县古寨瑶族乡古朗屯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 
- 14 荀丽丽:《与“不确定性”共存:草原牧民的本土生态知识》,《学海》2011年第3期。
- 15 周琼:《环境史视野下中国西南大旱成因刍论——基于云南本土研究者视角的思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 16[美]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 17[美]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第4页。
- 18 左停、唐丽霞主编:《变迁与发展:中国农村三十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 19 王旭辉、包智明:《脱嵌型资源开发与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困境——基于四个关系性难题的探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 20 参见刘敏:《生计“脱嵌”生态——内蒙古科尔沁地区水资源问题的社会学考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